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守仁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

V. S. 奈保尔作品研究

方杰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YZLI0890191258

-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守仁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 V. S. 奈保尔作品研究

方 杰 著



YZLI0890191268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 : V. S. 奈保尔作品研究 / 方杰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 王守仁总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11389 - 5

I. ①多… II. ①方… III. ①奈保尔,
V. S. (1932～) — 文学研究 IV. ①I56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2610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守仁
书名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虚构与纪实 : V. S. 奈保尔作品研究
著者 方杰
责任编辑 张静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23
照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10 千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1389 - 5
定价 4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学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继承和表现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活力。当今世界,“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越来越频繁。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需要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认识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从深层次上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南京大学研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历史悠久,基础厚实,范存忠、陈嘉、何如、张威廉等一批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奠定学科构架和特色,培育优良的学术传统。早在1979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80年创办《当代外国文学》,该刊物现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南京大学是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驻所单位,设有多个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机构,如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日文化研究中心、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欧洲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爱尔兰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韩国学术研究中心等,学术资源丰富。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并形成团队优势。他们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外国文学体裁(小说、诗歌、戏剧)、国别文学史、文学批评理论、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翻译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等领域默默耕耘,扎实工作,取得了包括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在内的许多高水平研究成果。2009年11月,以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各专业研究力量为依托的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被确立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在国外的一流大学,素有进行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传统,覆盖面广,且有相当的深度,对当代学术创新和理论话语建构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中叶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是用多学科的方法开展研

究。进入 21 世纪，文学研究拓展到伦理、种族、性别、生态环境等领域。同时，文学审美研究和经典的回归也是新的动向。南京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这一特点为文学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发挥学术研究的传统优势，围绕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基本问题，确定了若干系列研究课题，即“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态势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研究”、“文化与全球化研究”。这些课题作为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已获江苏省教育厅批准正式立项。

为了展示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成就，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和学术队伍建设，促进学术交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编进文库中的论著大多为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内容上涵盖了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面，反映了研究人员活跃的学术思想、独特的学术视角、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该文库关注当下外国文学理论发展动向和国别文学研究现状，从全球化和本土视角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和北欧国家的文学进行系统的阐释，考察 30 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观念流变和研究状况，同时进一步拓展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获奖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审美价值、话语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力求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审视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并以“文化与全球化”为主题，分析和阐释当代西方社会的特殊文化现象，着力探讨全球化对东西方社会造成的文化冲击，寻求本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产出高水平、创新性科研成果是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首要任务。编辑出版“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是基地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我衷心希望文库越办越好，不断扩大其学术影响，努力打造精品，为提升我国的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水平做出贡献。

王守仁

2010 年 10 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001
第二章 生养之地的文学想象.....	028
第一节 “小人物”的世界.....	030
第二节 知识的神话.....	038
第三节 民主的狂欢.....	046
第四节 无效的奋斗.....	052
第三章 纪实与虚构:写作空间的拓展	069
第一节 加勒比印象.....	070
第二节 英国式小说.....	081
第三节 殖民地人的困惑.....	087
第四节 新世界的历史想象.....	098
第四章 后殖民社会的文化表征.....	106
第一节 自由的悖论.....	107
第二节 虚妄的革命.....	118
第三节 暗淡的前景.....	131
第五章 写作之谜:从边缘到中心	141
第一节 中心的定位.....	142
第二节 英国性之解构.....	148
第三节 “未曾书写的故事”.....	164

第六章 旅行写作.....	178
第一节 “想象停驻的地方”.....	180
第二节 古文明的伤痛.....	193
第三节 当代印度口述史.....	203
第四节 信徒的革命.....	217
第五节 驯服者的国度.....	230
第七章 流亡知识分子生活“写真”.....	242
第一节 凄凉的人生故事.....	244
第二节 夹生的非洲社会.....	248
第三节 神奇的种子.....	252
第八章 尾声.....	259
第一节 作家之所见.....	260
第二节 再访非洲之旅.....	263
第三节 结束语.....	266
参考文献.....	270
索引.....	284
后记.....	290

第一章 引言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斯·金(Bruce King)在新近出版的多卷本《牛津英国文学史》第十三卷《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开篇写道:“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迁。这场变迁体现在主题和感性方面,它与早先产生诸如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风尚以及现代主义的感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人们通常将这种变化谓之为后殖民主义。”^[1]这位批评家认为,与英国文学史上先前的变化不同的是,这场变化发生的基础乃是欧洲以外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视角、新的关切,使之聚焦于移民生活及其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出现的这种重要变化,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结果,与战后英国社会结构乃至整个世界秩序格局的变化,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千百万英国人走上街头,欢天喜地地庆祝战争胜利。在经历了六年战争的艰苦磨难之后,他们的欢欣喜悦自然可以理解。不过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似乎并没有怎么考虑为了赢得这场胜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英国国际地位产生的深远影响。1939年战争开始之初,英国还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而到了1945年,尽管大英帝国的地盘毫发未损,但是英国的实力却大大削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则成了瓜分世界的霸主。此外,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失败也使得其治下的许多国家坚信,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大势已去,再也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47年,印度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终于获得独立,从而揭开了大英帝国走向终结的序幕,巴基斯

[1] Bruce K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坦、缅甸、斯里兰卡相继在两年内独立。声势浩大的去殖民化运动在 20 世纪 50 年代达到高潮，英国不仅失去了其在东、西非的领地，就连肯尼亚和塞浦路斯也出现了试图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了遏制势力强劲的去殖民化进程，英国政府于 1956 年和法国、以色列政府合谋悍然出兵埃及，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又名“第二次中东战争”），报复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实施的国有化。英国公众对此反应不一，不同意见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十分强烈，国际社会亦同声谴责这种侵略行径，苏联以发动核战争相威胁，美国则通过联合国对英法两国施压。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英法军队被迫从埃及撤退。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教训十分深刻，是大英帝国衰落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不仅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也是大英帝国走向瓦解的开端。它让英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英国已不再是昔日那个风光无限的世界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还得看他人眼色行事。

1962 年，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说：“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一个帝国，并且还没有找到角色。”这种观点得到众多英美人士的应和。他们认为战后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受到多重因素的界定，比如含糊其辞的内省和怀旧、文化障碍、中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反技术的浪漫主义以及闭关自守等。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绘画中的比喻、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个人声音、电影和电视中的幽默和家庭气息，这些都构成对战后欧美主导艺术形式的拒绝，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英国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战后英国作家中普遍存在信心和抱负的缺失。战后英国小说的寓言化和自省性倾向以及诗歌和戏剧中所表达的怨恨与焦虑，充分表明帝国主义对历史叙事已不再信心满怀，是“后帝国忧郁”（post-imperial melancholy）的表征。^[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英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战后从前殖民地汹涌而来的移民潮改变英国文化的方式。即使是在对战后的种族主义政治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种族骚乱津津乐道之时，新近的评论家们就已经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青年文化和大众文化已经在英国形成了新的跨种族认同，而后殖民批评家在考察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候，更多的

[1] Alistair Davies, & Alan Sinfield (eds.), *British Culture of the Postwar: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45—1999*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2–3.

则用移民经验来界定大多数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经验。

战后英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加勒比、印度、巴基斯坦和东部非洲，这些英国的前殖民地。1948年，三艘载有七百多名移民的船只从西印度群岛到达英国，这些移民大多为来自农村的失业青年。这些人通常只受过初等教育，到英国后主要从事一些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战后英国劳动力资源的不足。这批移民的到达可以看作战后新移民潮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后，更多移民纷纷从其他前殖民地涌入英国。应该指出的是，大英帝国瓦解之后，它与其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依然十分密切。为了继续保持这种联系，英国政府设立奖学金吸引前殖民地的青年来英国求学。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成后留在了英国，他们与先期来到英国的那些印度人、非洲人和西印度人，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海外移民的主体。这场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当英国因为帝国的崩溃冒着将其眼光局限于“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的风险时，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却逐渐将英国改造成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包容性社会，而他们当中的文学工作者的写作，更是使得英国文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并呈现出崭新的风貌。^[1]

战后影响深远的英国移民文学，既是英国社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又是这种变化的文化表征。新移民来到英国之初，除了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问题以外，最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就是住房。文化和生活上的双重困难很快便催生出移民社群，新的移民文化在来自不同地区移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中有些后来得以保留并融入新的英国文化，比如，特立尼达的卡里普索(指特立尼达人即兴演唱的歌谣)和印度人的寓言等。移民文学通常都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这与移民作家对宗主国文化，尤其是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有关。20世纪50年代从加勒比地区来到英国的一批移民作家，比如乔治·莱明(George Lamming, 1927—)、塞缪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 1923—1994)和V.S.奈保尔等人，他们的作品或展示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经验，或

[1] Bruce K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

考察早期移民在宗主国的战后环境中所面临的困窘，大多都采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进入60年代后，随着来自其他地区移民的加盟以及第二代移民的诞生，英国移民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发展成为英国文坛上一支强有力的生命力军，例如：来自印度的法鲁克·德洪迪(Farrukh Dhondy, 1944—)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来自巴基斯坦的塔里克·阿里(Tariq Ali, 1943—)，来自尼日利亚的布奇·伊迈切塔(Buchi Emecheta, 1944—)和本·奥克里(Ben Okri, 1959—)，来自埃及的阿赫达夫·索伊夫(Ahdaf Souief, 1950—)，来自日本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1]等等。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间，英国移民文学作为一种“集体的文学想象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富有特色的表达素材和手段”^[2]，为英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移民作家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3]，其中，奈保尔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是为英国移民文学赢得了国际性声誉。

V. S. 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1932—)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文坛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已出版著作32部，获得过许多荣誉，他的大部分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2001年，瑞典皇家学院在授予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时称，其获奖原因是：

他在作品中将富有洞见的叙述与正直的观察结合在一起，
驱使我们去了解那被压制的历史存在……奈保尔继承康拉德，

[1] 石黑一雄与其他移民作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不是来自前殖民地国家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且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基本上是在英国文化中长大成人的。

[2] 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 拉什迪和石黑一雄都以创作长篇小说而著称，前者的主要作品有《子夜诞生的孩子们》(Midnight's Children, 1980)、《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和《她脚下的大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等，后者的主要作品包括《浮世艺术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去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无法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 1995)和《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 2000)等。

在道德意义上是帝国命运的一名编年史家：帝国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他作为叙述者的权威存在于对他人业已忘却的事物、被征服者之历史的记忆中。^[1]

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将奈保尔的作品描述为“忠实于历史”之作，认为他对受压迫者历史的阐释受到道德而非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推动。这应该算得上是对奈保尔恰如其分的褒奖。作为一位数十年来始终关注非西方社会人民生存状况的作家和“永远可以被指望讲述第三世界真相之人”^[2]，奈保尔在许多作品中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讲述着“黑暗世界”的历史。至于奈保尔是否确实讲述了第三世界的真相抑或是某些真相，这应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评论者的价值观及其对第三世界真实状况了解的程度决定着其对作品的评判，因此他们难免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大相径庭的回答。有关这一点，下文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将有进一步的探讨，此不赘述。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奈保尔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题为“两个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奈保尔称自己是个“凭直觉写作”^[3]的作家；他这样说显然意在否定社会、政治等外在因素对他的影响，强调自己是“作为作家的作家而非作为社会人的作家”^[4]。不过，这也许是奈保尔的一厢情愿，因为无论评论者对他或褒或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投向其作品与当代社会、政治的相关性。

当奴隶制于 1834 年在大英帝国治下的特立尼达正式废除时，那里的甘蔗种植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于是大量营养不良的印度人从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前往特立尼达并成为契约劳工。当时特立尼达岛上占大多数的人口是黑人，这些新来的东印度人在异己的世界里感到不安，一方面惧怕体格强壮、性格粗暴的黑人，另一方面又因为其肤色将黑

[1]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http://www.nobel.se/index.html>)。

[2] Edward Said, “An Intellectual Catastrophe,” in *Al-Ahram Weekly On-line*, August 6–12, 1998.

[3] V. S. Naipaul, *Literary Occasions* (New York and Toronto: Alfred A. Knopf, 2003), p. 182.

[4] Ibid., p. 181.

人与印度教中的低种姓加以认同。而黑人则看不起这些东印度人，认为他们是习俗奇特的异教徒，不仅吝啬钱财而且对种植园主卑躬屈膝，为了多挣钱如同“新奴隶”在甘蔗田里加班加点。到奈保尔出生的时候，特立尼达的人口有四十万多一点，其中大约三分之一为印度人，多数为农业劳工、商人、酒贩子、职员和店主，很少人做律师、教师或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印度人社群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均高于其他社会群体。在 20 世纪 30 年代特立尼达大众传奇中，印度人通常的形象是贫穷、卑劣、排外、好斗、目不识丁的乡下人。^[1] 奈保尔就出生于生活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一个印度裔移民家庭，在父母生养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奈保尔的父亲是印度契约劳工的第二代移民，家境不是太好，长期依赖妻子家庭的经济资助。不过，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却凭着勤奋好学成为当地报社的记者。奈保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描写父亲和家里的境况：

他一生中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做记者。对他那一代的特立尼达印度人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家父生于 1906 年，那个时候特立尼达的印度人还是一个独立的社群，主要居住在农村，说的是印地语，依附于特立尼达中南部的甘蔗种植园。1906 年时的印度人许多都出生于印度本土，是签了为期五年的合同作为契约劳工来到特立尼达的。大英帝国内部这种形式的印度契约劳工直到 1917 年才结束——那是印度民族主义鼓动带来的结果。

1912 年父亲开始以印度为话题给《特立尼达卫报》零星撰稿。1932 年我出生之时，他已经成为了《卫报》驻查瓜纳斯镇的新闻记者。查瓜纳斯位于蔗糖产地的中心地带，是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聚居地，也是我母亲家族定居的地方。我母亲家族的人们早就不是契约劳工了，他们是大地主。

我出生之后大约两年，父亲离开了《卫报》，原因我永远也搞不清。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他四处做些临时工作，时而依附在我

[1] Patrick French,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p. 13.

母亲家这边，时而回到他的一个舅父那里寻求庇护。那舅父很富有，是岛上最大的一家大公交公司的创建人和持股人。父亲本人就很穷，再加上那些还在做劳工的亲戚，他一生都不得不在这两个大家族之间摇摆，处于半自立半自尊的状态。

1938年，父亲重新为《卫报》所聘用，这次是做城市记者。我们——父亲、母亲和他们的五个孩子，我母亲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分子——搬到西班牙港，住在我外婆的房子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街道的生活（了解到那个总在做着“没有名字的东西”的黑人木匠的秘密）。也是打那时起，我逐渐了解了我的父亲。^[1]

奈保尔少年时代是在家庭不断的搬迁中度过的。他所生活的环境是殖民地世界里一个封闭的印度人社区，不光与整个特立尼达社会处于隔绝状态，就是与印度传统也缺乏有机的联系。奈保尔六岁那年，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人移居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可是即使在那之后，一家人也依然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直到1947年父亲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情况才有所改变，而那时奈保尔已经十四岁。1950年，十八岁的奈保尔获得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不过，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活令他十分失望，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那些他认为丝毫无助于实现作家梦的文本上。在赴英国留学之前，奈保尔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精神禁锢和印度教徒社群的封闭世界里，如果说孩提时代还有什么值得怀念的，那就是父亲给他讲述的那些英美作家的故事以及父亲自己写的故事。虽然父亲空怀了一世的作家梦，可是他为儿子开启的通向文学之门，最终成就了奈保尔毕生的事业。

奈保尔的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在牛津就读期间，他就已经开始尝试写作。大学毕业后，他怀揣着仅有的六个英镑到伦敦谋生，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加勒比之声”栏目的自由撰稿人。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处女作《米格尔

[1] V. S. Naipaul, *Finding the Center: Two Narrativ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6), pp. 20–21.

街》的创作，这是一本彼此相关又独立成章的短篇故事集。由于出版商担心短篇作品销路不好，该书未能马上面世。不过，奈保尔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转而开始撰写长篇小说。1957年《通灵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得以付梓问世，在随后的四年间，奈保尔连续出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和《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四部小说。这些虚构作品全都以特立尼达人的生活为题材，以喜剧为格调讲述特立尼达人，尤其是印度移民边缘化的生活以及他们无效的努力。它们构成奈保尔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使得奈保尔被毫无疑义地收入“英联邦文学”这个新的文学史范畴。所谓的“英联邦文学”乃是英国学术机构与出版商合伙杜撰的一个文学史范畴，包括英联邦自治领域的属民用英语写成的新作品。^[1]不过，随着后殖民理论的流行，“英联邦文学”这一术语逐渐被“后殖民文学”所取代；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on）主张采用“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术语，其所指涉的范畴与上述两个术语大致相同。

与许多初涉文坛的作家相比，奈保尔是幸运的。《通灵按摩师》问世之后，纽约前卫书局于1959年推出了其美国版本。同年该书获得“莱斯纪念奖”，随后便有论者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评介。此后，每逢奈保尔有新书问世，这个刊物大都会发表相关书评，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可以看作奈保尔之受西方论者青睐的一个佐证。^[2]总的来说，这些早期书评关注的焦点是奈保尔作品中对特立尼达印度移民生活的喜剧性描写，而且大多为赞赏之辞。马丁·雷文（Martin Levin）在为《通灵按摩师》撰写的书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部源于特立尼达的小说，揭示了属于加勒比地区印度人世界的一种富有种族幽默感的风格。”^[3]查尔斯·普尔（Charles Poore）评介《米格尔街》时称，这是一本

[1] Fawzia Mustafa, V. S. Naipau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

[2] 此外，在其他报刊上也有许多评论性的文章，但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统计。

[3] Martin Levin, "How the Ball Bounces Down Trinidad Way,"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59.

“出色描写其自己世界”^[1]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德里克·沃尔考特^[2]曾多次撰文评论奈保尔早期的创作，对其作品中的智慧和反讽赞赏有加。1961年，《米格尔街》荣获“毛姆短篇小说奖”，同年出版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更是确立了奈保尔作为长篇小说家在英国文坛的地位。论者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代表着奈保尔对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安德鲁·古尔(Andrew Gurr)说，《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也许是自第三世界独立以来最出色的小说”^[3]。迈克尔·托尔普(Michael Thorpe)指出，《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是“一部罕见的杰作……是典范之作”^[4]。理查德·克利(Richard Kelly)认为，“这部表现一个人寻求独立与尊严的长篇小说，超越了奈保尔早期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具有普遍的吸引力”^[5]。此外，《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还于1998年7月与《河湾》一起，入选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兰登书屋“当代文库”评出的20世纪百部英文著名小说，被誉为“当代经典”^[6]和“后殖民世界的史诗”^[7]。

1960年，在《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完稿之后，奈保尔得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提供的资助，回到加勒比地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两年后，他根据这次考察写成非虚构作品《中途：西印度及南美洲五种法国和荷兰社会之印象》(*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 of Five Societies—French and Dutch—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1] Charles Poore, “Miguel Street,”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5, 1960.

[2] 德里克·沃尔考特(Derek Walcott, 1930—)也是从加勒比地区走出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92)，其作品以生动描写加勒比文化而著称，比如：《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 1973)、《巨制》(*Omeros*, 1990)和《浪子》(*The Prodigal*, 2004)等；他撰写的赞扬奈保尔的书评主要发表在《特立尼达卫报》上。不过后来，他却成为奈保尔的严厉批评者之一。

[3] Andrew Gurr, “Third World Novels: Naipaul and After,” i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7.1(1972), p. 11.

[4] Michael Thorpe, V. S. *Naipaul* (London: Longman, 1976), p. 14.

[5] Richard Kelly, V. S. *Naipaul*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 9.

[6] Mel Gussow, “The Enigma of V. S. Naipaul’s Search for Himself in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1987.

[7] Pankaj Mishra, “Introduction,” in *Literary Occasions*, p. xi.

1963,以下简称“中途”)^[1],这是他第一部旅行写作作品,也是其第一部引起争议的作品。该书的出版成为奈保尔文学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其文学生涯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旅行是奈保尔生活的常态。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奈保尔不仅多次访问特立尼达和印度,而且还在亚洲、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留下足迹。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民族国家,那里的高等学校则成为文化去殖民化的中心。1965—1966年,奈保尔受一家美国基金会委派,前往乌干达的马克瑞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在那里与美国作家保罗·索鲁^[2]相识。当然,奈保尔并没有真正做教书匠,而是利用这个时间从事写作。世界范围的旅行生活为奈保尔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他能够写出大量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包括《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 1963)、《黑暗之地》(*An Area of Darkness*, 1964)、《效颦人》(*The Mimic Men*, 1967)、《岛上的旗帜》(*A Flag on the Island*, 1967)、《黄金国之失落:一部历史》(*The Loss of El Dorado: A History*, 1969,以下简称“黄金国之失落”)、《自由国度》(*In a Free State*, 1971)、《过度拥挤的奴隶收容所》(*The Overcrowded Barracoon*, 1972)、《游击队员》(*Guerillas*, 1975)、《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伊娃·庇隆之归来与特立尼达的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o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 1980)、《在信徒中间:伊斯兰国度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以下简称“在信徒中间”)等。这些著作大多以严峻的语气或悲剧性的格调为主,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色彩。随着这些著作的出版,奈保尔的声誉日隆,他不仅摘取了包括“布克奖”在内的所有重要的英国文学奖项,而且其《游击队员》还荣

[1] 该书初版时的标题是 *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British, French and Dutch—in the West Indies and South America* (London: Andre Deutch, 1963), 后来在美国出版时书名改为 *The Middle Passage: The Caribbean Revisit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2)。

[2]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 1941—)曾写过两本有关奈保尔的书——《V. S. 奈保尔作品导论》(V. S. Naipaul: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和《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一场跨越五大洲的友谊》(Sir Vidia's Shadow: A Friendship Across Five Continents),两本书中间相隔26年,其中对奈保尔的评价几乎截然不同。